

愛、疏離與暴力——論七等生〈精神病患〉的疾病與醫療之路

蕭義玲*

〔摘要〕

「疾病」的隱喻揭示了社會文化，乃至個人存在狀態的問題，它是現代性課題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本文試圖將〈精神病患〉視為一個探討現代人存在樣貌之文本，而提出以下問題：在「疾病/醫療」的隱喻中，七等生為何選擇「精神疾病」作為現代人存在樣貌的表徵？「疾病/醫療」的隱喻如何透過小說的敘事呈現？又，對向來善於將自我寫入文本，並意欲在寫作中完成自我的七等生言，他如何透過「精神病患」的書寫以探入自我的「內在生命世界」？以及，就詮釋總是指向豐富人的存在意義言，對「精神疾病」、「精神病患」的闡述，是否仍能對處於當下時空的我們發揮啓示效用？

透過「精神病患賴哲森」的醫療歷程，我們看到了一幅現代人的存在景觀：失卻定向、覓無居所、冷漠疏離也拒絕感受，然而此一無愛的荒原景象，卻也召喚出內在於人心的「醫療」渴求：尋找定向、覓得居所、恢復體驗更能與人交流。如此的醫療所觸及的已不僅是賴哲森的個人之病，更是普遍性的現代人之病。因而本文以為，「醫療」最終指向的已非疾病表象的治療，而是愛的意向性之醫療，它亦是對「家」的寓意之深度闡明。透過如此的「疾病」與「醫療」之隱喻，在作者、文本與讀者的視域融合中，我們亦將被帶入自身的存在之思中，這正是詮釋的饒富深意處。

關鍵詞：七等生、精神病患、醫療、寫作、愛、疏離、罪性、家

*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在「疾病」中召喚「醫療」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在科技文明的強勢操控下，現代社會中人的存在狀態一直是學界所關注的重要課題。而在眾多的現代性課題中，「疾病」作為生存狀態的隱喻，更在近年受到學界極大的注意。「疾病」與「身體」的密切關係在於：當人無法擺脫整個社會文化語境時而處於其中時，身體的種種符號便會成為反映社會文化的一個窗口；同時，當社會文化出現問題時，它亦會投射到身處其間的身體上。因而「疾病」的隱喻揭示了社會文化，乃至個人存在狀態的問題，它是現代性課題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如（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便說到：「例如說到『病理現象』，它意指身體上出現的某些變故，它們顯現著，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它們顯現的東西『標示著』某種不顯現自身的東西」；¹（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也說道：「正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多重病因的(這就是說神秘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感到不正確的事物」，²一如不測的病情把活生生的人捲入一場脫序混亂的生存狀態中，並使潛在於生命中的死亡現形，在現代科技的強大操控下，「疾病」作為人與社會文化，乃至個人存在狀態的隱喻，亦使看似規律有序、合理平整的世界表象露出潛藏其中的裂痕來，因而「疾病」所在之處，「醫療」之需要亦被喚起，「疾病」與「醫療」的雙向關係，已成為觀看現代人生存特徵之有效途徑。

透過以上討論看七等生的中篇小說〈精神病患〉，³作家以「精神病患」⁴的疾

¹ 見（德）海德格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頁37。又（美）S.K 圖姆斯：「一個人只有在生病時（而不是健康情形下）才能明確體驗到軀體的「隱匿性」和「異己性」存在。」見（美）S.K 圖姆斯著，秋鴻鍾等譯：《病患的意義：醫生和病人不同觀點的現象學探討》（山東：青島出版社，2000年），頁85。

² 見（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頁55。

³ 七等生的〈精神病患〉首次刊登在《文學季刊》第二期（1967年），1970年由大林出版社出版（已絕版）（從初版到再版，小說內容有稍微的改動，相關的討論可參考吳而斌：〈七等生的《放生鼠》〉，收入張恆豪編：《火獄的自焚》（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49-57。〈精神病患〉後來改由遠景出版社出版（1977年）。2003年遠景出版社再度將七等生的全部作品依照寫作順序，出版為一套「七等生全集」（共十本），〈精神病患〉被

病隱喻，將現代社會中，現代人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與身處其間的存在感受，敏銳地揭示出來。對七等生言，「寫作」向來被他賦予極為重要的意義：除了是與世界溝通的管道外，更是他理解、救贖，乃至完成自我的方式。透過「寫作」，七等生取得了一個重新觀看世界與自己所處位置的視角，七等生曾如是賦予寫作意義：「文學家的任務並不在提倡高調的生活哲學，也並不規劃什麼健全的倫理；但他的責任是批判現時的社會生活，更重要的是揭露人類生存的心象」，⁵且又說道：「對內在生命世界的闡述，本來就是我寫作一直延展不變的主題」，⁶作為一位哲思性格濃厚的作家，此一「揭露人類生存的心象」、「對內在生命世界的闡述」之寫作特質亦普遍地為評論者所關注，如張恆豪便如此說道七等生的創作主題：「七等生的著眼點自不在於現實表象而是揭露內心的感應。他苦悶的象徵，乃在於人心中自然性與社會性的衝突和抉擇」；⁷至於同為創作者的楊牧則在七等生虛實交錯的寫作手法中捕捉到一個核心命題：「他所感受體驗於一個變化多端的社會中的現實問題才是他小說的中心關注」，⁸所謂「自然性與社會性的衝突和抉擇」、「變化多端的社會中的現實問題」，我們可歸之為一個關切「人的存在特徵與變貌」之課題，而「疾病」正是作家切入此一命題的有效途徑——透過「疾病」的書寫，作家揭

收錄於「七等生全集(2)《我愛黑眼珠》」中。本文的討論以此版本為主，以下正文的引述中，將直接在引文後標上頁數。

⁴ 在精神醫學上，「精神病」可區分為「精神分裂」與「精神官能症」二者，七等生〈精神病患〉一文中，賴哲森的主訴症狀，如心悸、胸悶、窒息感、氣喘等，應可被劃為「精神官能症」之範疇。但因七等生寫作的著眼點並非在於醫學之討論，因此，七等生雖以主角賴哲森為「精神病患」，但僅是將「精神病」視為一個疾病的隱喻，用以推進小說的敘事發展，而不涉及精神醫學上對「精神病」範疇之嚴格界定。因這是文學而非醫學的論文，故此在本文的討論中，亦僅就作者所使用的「精神病患」之指稱來展開論點之討論，特此說明。

⁵ 見〈來到小鎮的亞茲別(序)〉，收錄於「七等生全集(10):《一紙相思》」(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263。

⁶ 見七等生:《散步去黑橋(自序)》，收錄於「七等生全集(10):《一紙相思》」(出版項同上),頁286。

⁷ 見張恆豪:〈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程〉，收錄於「七等生全集(6):《城之迷》」(出版項同上),頁392。

⁸ 見楊牧:〈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收錄於「七等生全集(8):《重回沙河》」(出版項同上),頁363。

築出其觀察世界與自我存在狀態的眼光。準此，面對〈精神病患〉，我們要問的是：在「疾病／醫療」的雙重隱喻中，七等生為何選擇「精神疾病」作為現代人存在的表徵？它如何透過小說的敘事呈現？又，對向來善於將自我寫入文本，⁹並意欲透過寫作來理解自我、完成自我的七等生言，他如何透過「精神病患」的書寫以探入自我的「內在生命世界」？最後，就詮釋總是指向豐富人的存在意義言，對「精神疾病」、「精神病患」的闡述，是否仍能對處於當下時空的我們發揮啓示效用？以上問題不僅是對作品的隱喻意涵之追問，亦是試圖對現代人存在處境之深刻理解，因而透過詮釋活動的進行，我們亦將被帶入自我的存在之思中。以下我們將以細讀文本的方式展開隱喻的討論。

二、「精神病患」的隱喻：從「症狀表象」到「生命意向性」的治療

七等生所著的〈精神病患〉分為三卷，第一卷敘述意欲寫作的青年賴哲森因心臟不適至聖母醫院就診，而後被診斷出他所患的並非生理性的心臟疾病，而是精神疾病，並被醫生建議往赴精神病院治療。與此同時，他邂逅了在冰果室工作的童年友伴阿蓮，並與阿蓮一起出遊，之後兩人在賴哲森所租賃的簡陋小屋中同居且結婚。然而，賴哲森的症狀並未好轉，在與精神醫師的懇談下，他終於娓娓道出潛藏於心的過往記憶。第二卷寫道這段他所壓抑的記憶：任小學教師的賴哲森初到馬東小鎮，這是一個滯悶封閉，且為種種流言蜚語所包圍的小鎮。才到學校，賴哲森便邂逅了同校的如母姐一般的丘時梅老師，兩人且有一段曖昧的情愫，

⁹ 七等生小說中的一個鮮明特質便是自傳性色彩濃厚，因而其作品中，現實自我與文本自我之間的關係向來為評論者所注意。七等生小說的寫作主題與書寫方向，常常可以在其生活年表中找到充分的對應性，如〈精神病患〉便透露了作者早期在九份國小與萬里國小教書的某些經歷(七等生全集的書末皆附有作者自撰，張恆豪增補的寫作與年表，請自行參閱)。七等生曾如此說道自己的創作理念：「對於自我與世界之間，我完全依照我的習性、感情和理念紀錄我在生活中經驗的事。甚至以我為主題，來探求生命哲學。」(見〈情與思(小全集)序〉(1977年9月)，收錄於「七等生全集(10)：《一紙相思》」，頁275)；張恆豪於〈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程〉一文中亦提及七等生的作品特質，「都是作者每一生活階段中自我的化身」以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生活經歷的寫實，所以我們將各片段串聯起來，不難窺出其生活的斷面。」(出處同註五)，頁393。

但馬束小鎮的氛圍與丘時梅的已婚身分，令賴哲森無法實現其愛戀的理想，賴哲森最後且遭致被追殺的命運。第三卷寫道娓娓道出一切之後，賴哲森所要面前的是如何繼續生存之問題。此一問題以賴哲森與阿蓮的婚後生活呈現：阿蓮不久懷孕，卻被宣告死胎，好不容易在與死神拔河的奮戰後，兩人再回到平常生活，阿蓮不久又懷孕，賴哲森亦被醫生告知其血液中染有梅毒，不忍告知阿蓮胎兒可能再度不保，賴哲森以不斷的性交之愉悅來撫慰供養家庭生計之阿蓮，但卻在一次性交後將阿蓮扼死了，賴哲森不久被警察逮捕，並告白了如上罪行。

將「精神疾病」視為存在狀態之隱喻，圍繞在〈精神病患〉一文中，「賴哲森」的角色塑造與患病情節發展，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首先，第一卷中，小說以賴哲森「醫療的需要」起頭，而「醫療的需要」則被描述為一段賴哲森尋求醫療的動態歷程：先到抵「聖母醫院」尋求醫治，再轉赴「精神病院」，再深入到一段須自我面對的心理治療中。而在醫療歷程的展開中，童年友伴阿蓮亦適時地出現在賴哲森面前，兩人且在一次同遊之後結婚，共組家庭。從聖母醫院、精神病院，到與阿蓮於破舊小閣樓共組家庭，空間的不斷轉換中，我們要問的是：「聖母醫院」、「精神病院」，乃至於與阿蓮共組家庭的「破舊小閣樓」，在賴哲森的醫療歷程中佔據什麼位置？其次，第二卷中，賴哲森既然必須重新面對那段他潛抑極深的往事，才能理解患病原因並獲得平靜。則在醫療歷程中，「馬束小鎮」與「丘時梅」之於他的寓意為何？再次，第三卷中，坦白過往的賴哲森雖已獲得平靜，但面對未來，醫生表示無法提供協助，因而賴哲森又必須自己負起醫療責任來。然而，對意欲獲得治療的賴哲森言，他如何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環環相扣的時間之流上，斷除致病之鎖鏈？從與阿蓮結婚、阿蓮懷孕，到賴哲森發現染上梅毒、以性交的愉悅撫慰阿蓮、扼死阿蓮、最後自我告白罪行，在疾病/醫療的雙重寓意上，這一路婚姻發展軌跡的寓意為何？究竟什麼是作者所指陳的「精神疾病」與「精神病患」？最後，以謀殺終篇，此一悲劇性的結局如何回應於「疾病」與「醫療」的雙向隱喻？

（一）疾病、診斷與醫療：生命定向的徬徨與抉擇

先來看小說的首段敘述，第一人稱敘述者賴哲森如此形容自己的症狀，以及自己所需要的醫療：

聖母院門診內科醫師准許我住院後，我還心有餘悸。我在那位看起來頗有

涵養且帶著幽默的義大利籍內科醫師面前，極力用誇張的事實形容我在平時是怎樣地感到氣喘不適，晚上睡不成眠；事實上，我自己清楚心臟病沒有什麼堪慮的異狀，要是真有，那只不過是一般人在波動和緊張的生活競爭中，或是經過了極度的被惡意的干擾後所顯示的心臟亢進。……整個診斷過程我都抱著很大的恐慌，這也許就是他認為我有心臟病嫌疑的原因。現在我真為我有了心臟病的嫌疑高興，我甚至希望我有心臟病，那麼我可以不必再回到小鎮的學校去教書，我可以躺在病床上避去那些可怕的紛擾，我甚至有充分的時間研讀戲劇書籍，將來另謀職業。假如我真的有心臟病，這無疑使我獲得了一個幸運的安全庇護，從此我憑這個藉口不讓外界的一切刺傷我。

……當我憶及我是由一個可鄙的環境逃避到此地時，對被疾病殺死自自然然產生一種自憐的溫慰而絲毫不覺它可怕。我還估量假如我能對某些學術注意和獲得它們，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機會迎著我達成心中的理想，把一個牽縛的且充滿污跡的教職工作在求生中脫開。所以，一旦踏進保護我不受傷害的醫院，我的意志產生自信，我就不會因這還處在懷疑的心臟病死去。(223-224)

小說開頭揭出了一個具明顯焦慮症狀的賴哲森形象，而其尋求醫療，竟似是在為自己勾勒一幅新生活的遠景。「醫療」之於賴哲森，起於被正名(被診斷為心臟病)的需要，透過正名，他才可以獲致「聖母醫院」的接納(住院治療)，並在其間實現讀書寫作的理想。對尋求醫療的賴哲森言，「聖母醫院」是可治癒疾病的醫療院所，亦是他為自己設定的，可隔離世界並實現理想的安穩居所。因此躺在病床上等待檢查的賴哲森，如此說道心情：「甦醒時，積壓已久的窒悶馬上被它潛移斷代，意識追隨著奇妙的旋律，心中漸漸充滿悅樂，彷彿誕生於新的環境中。」(226)晚間，他甚至感到「大獲從未有過的讀書的樂趣」(232)。然而此一建立在隔離世界的醫療，卻掩不住他埋藏極深的內疚之感，當修女、修士和見習醫生巡房後，賴哲森道：

事實上，內心隱瞞著一個更重大的內情才使得我見了這一類人時感到膽怯不安，我真希望經由他們的証實確定我的病因後，移除這種內疚因素。可是，一會兒，我便藉著一種漠視一切的感情恢復了平靜，我總是憑藉這類

的感情排除一切不能解決的內心的阻難，只需這個時刻我不在我認為鄙陋的環境，或不遭受一些可惡的人的打擊，有沒有病都無甚緊要，至於將來，那是多麼遙遠而不可能先行預測的日子，只要能到達那時，便會有另一個脫逃或解決的辦法……（228）

不僅是醫護人員，賴哲森與此醫療方式的不容，還表現在他無法成為「聖母醫院」的病人群體之一員，他雖然想以「病人」的身分住進聖母病院中，但在住院檢查的時日中，除卻讀書之外，賴哲森不斷地以臧否人物來區隔於同住一室的病友，最後，賴哲森不只試圖與他人劃清界線，同樣地，他也感到所有「聖母醫院」的病人對他投以懷疑眼光（229），以故，在等待被「聖母醫院」收留的過程中，如此無法與環境相容的「漠視一切」的人格特質，反而讓賴哲森自己陷入了一場更大的疾病風暴中，他不時地幻覺著自己的死亡並產生窒息之感（231）。但不過四天，檢查報告出爐，賴哲森惴惴不安的心思瞬間轉為難堪困窘，粉飾的面具被當眾揭穿，醫生診斷他應為精神疾病，而非可被聖母醫院醫治、收留的心臟病，如此的宣判無疑是驅逐的命令，賴哲森的醫療計畫破滅，失去聖母醫院的庇護，賴哲森再次成為一個覓無居所的病人／漂泊者。

不妨深思賴哲森如此渴望與「心臟病」及「聖母醫院」認同的心思：一方面，成為一位心臟病患者，他便可以「理所當然」地獲得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二方面，若被醫師證明／正名為「心臟病」，並獲得「聖母醫院」收留，他便可以將醫療重任，全然交由外在的醫療專業承擔，而免去自我面對的責任。因而，「聖母醫院」的驅逐，無疑地將賴哲森內心所隱藏的秘密揭露出來，不一樣的只是，經歷了這出入於「聖母醫院」的一段歷程，賴哲森的病情愈加沉重了，他不只回到那個患者種種不堪負荷症狀（心悸、氣喘、胸悶乃至窒息感等）的病人／漂泊者原點，更要承受不斷漠視、壓抑下的死亡意象之侵襲，行無去路，甚至竄出自殺念頭，賴哲森只得再續醫療的歷程，將自己帶到「精神病院」前。作為醫療歷程的延續，我們要問的是，「精神病院」有可能成為賴哲森理想的醫療居所嗎？

和「聖母醫院」不同的是，初來乍到「精神病院」的賴哲森，如此描述他眼中所見的精神病院，與被劃為可能是同類的精神病患：

我後來在北市河邊的一條堤霸車道找到了精神病院的所在。……一群樣子呆癡或過分活潑的男女交雜在一起遊玩。有的投籃球有的打羽毛球，有的

打乒乓和跳繩，由穿制服的男女護士監視著。……預先有的意識使我審視他們時，自身感到一陣陣冷徹的寒顫；我不能容忍我可能是他們類族中之一，這比起做一個為環境包圍迫害的普通人更難以忍受。我寧可選擇我是極危險的心臟病者而不要被指為是個精神病患者。一位護士移近一位興高采烈地和同伴奪籃球的病人，輕拍他的肩膀，對他溫和地說：「阿賓，你要去洗澡休息了。」那位男人抗辯道：「再等一會兒，再等一會兒。」她拖拉著他，其他護士都走向他們的病人。「今天你已經太累了。」他疑問道：「真的嗎？我真的疲乏了嗎？」她已經帶走了他。……我苦惱地否認精神病者是處在自己幻想的快樂天地中的說法，同樣地，這也是一個被束縛和支配的領域，為憐憫所圍限的一個更窄小的世界。這種天地將更不能尋索些什麼價值，顯然脫離了真實和自由，最後只有窒息而亡的結果。

(236)

若說「聖母醫院」是賴哲森欲與之認同卻不可得之地；顯然地，「精神病院」便是賴哲森意欲逃離的恐怖住所，然而此一「逃離」姿態，又將再度把他帶到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者位置上——長期以來，賴哲森一直希望獲得一個隔絕外界的安居之所好獲取寫作的自由。但在醫療體制的保護、隔離與監控下，眼前這群癡呆男女的模樣又令他感到極度恐怖：生命的絕對安穩是以意志的徹底癱瘓來換取的。如此影像觸及賴哲森內心掩藏的焦慮，醫療的起點亦由此萌現，他心中自然湧出「不要成爲一個精神病患」的選擇。然而人如何可以「不要成爲一個精神病患」？作爲「疾病」之診斷、「醫療」的起點，我們先來看一則心理學家(瑞士)榮格(C.G.Jung)所開出的醫療處方：

在精神病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種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種希望與慾望的形式，要是不了解它們，那末過錯在我們身上……人格的一般心理，是隱密地潛藏在精神病之內，甚至就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久久前人類的各種矛盾與衝突。病人或許顯得麻木不仁、悲愴，或完全像是個白痴，但是他們的心靈仍然活躍著，其中有意義的東西比乍看之下還要多。從本質來說，我們沒有在精神疾病裡發現什麼新鮮、了不起的東西；相反地，我們遇到

的是他們本性的基礎。¹⁰

既如榮格所指出的：「在精神病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種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種希望與慾望的形式」，則賴哲森此刻所需要的醫療，便不僅是對特定的症狀表象之治療，更觸及賴哲森的所以成爲一個病人／飄泊者之「本性的基礎」治療，即必須將「症狀表象」的治療轉爲「生命意向性」的醫療。¹¹透過「生命意向性」的醫療，賴哲森才可能實現其「不要成爲一個精神病患」的願望。

如此看來，當賴哲森無法匿名遁入病人族群，當他須走出封閉的醫院圍牆，且真實地站在「不要成爲一個精神病患」的生命選擇點上，他的醫療歷程才真正展開了。而在這生命的選擇點上，從精神病院走出的賴哲森巧遇了他的童年玩伴阿蓮，至此，這段醫療歷程遂變成由賴哲森一人獨行而至與阿蓮同行的旅程，我們以爲此一情節是饒富隱喻深意的：由一人的獨行而至二人的同行；由一人的獨白到二人交流之需要，與自我、世界的重新連結與遭遇，悄然攜出了被賴哲森漠視許久的醫療寓意，下文我們將對此一論點展開討論。

(二) 醫療的起點：與永恆的愛人／命運同行

不妨先來看一段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美）羅洛·梅(Rollo May)對精神疾病的說法，再討論「阿蓮」現形於賴哲森的「選擇不要成爲一個精神病患」之生命時間點的喻意。羅洛·梅說道：

我們從精神分析的實際工作中得知，自由匱乏的現象是在病患所有的機能面向中顯現：這包括了他的身體(肌肉的抑制)、所謂的潛意識經驗(潛抑)，以及他的社交關係(他幾乎無法察覺到別人的存在，以至於連自己的存在都難以察覺)……自主性和自由，不可能存在於有機體的某個特殊部分，而必須是屬於整體我(total self)——這個結合了思想／情感／選擇

¹⁰ 見榮格(C.J.Jung)著，劉國彬、楊德友譯：《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頁176。

¹¹ 所謂的「意向性」，羅洛·梅《愛與意志》書說道：「它是個人對於其置身於世的結構，所做出的積極回應。是意向性預先建造了基礎，才使得目的和意志論的出現成爲可能。」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臺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版)，頁342。

／行動的有機體——的一種特質。¹²

以及：

……意識狀態的改變同時涉及「外在」和「內在」，它包含了來自外在世界施於個人的力量，亦與個人如何傾聽這些力量的態度有關。……人的體悟，可能包括了覺察諸如童年時期業已遺忘或埋藏的事物，以及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所湧現的「深層」經驗。

這便涉及到——若我們試著「預測」後續的討論——全然迥異於純粹意圖(intention)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在人類的經驗中，意向性乃是意志與抉擇的基礎；它不僅發生在意志與抉擇之前，更是使其後二者的以發生的根源。¹³

羅洛·梅的說法可與上文的榮格觀點呼應。可以說，若精神病院中那些已失卻靈魂的精神病患所顯現的是身體、潛意識經驗以及人際關係的分裂解組問題，則如何復甦「本性的基礎」，並重新整合人的「思想／情感／選擇／行動」之分裂，使自己成爲一個具有意志與抉擇自由的整體性之人，此一生命意向性的問題，便成爲賴哲森此刻的醫療課題。

從意向性的醫療看「阿蓮」角色的塑造，我們注意到小說雖寫道「阿蓮」是一個冰果店店員，但對賴哲森言，如此一位在童年時期飽受欺凌，且未能獲得社會公平對待的「她」卻有極爲特殊的意義。賴哲森如此形容她以及與她的相遇：「能再遇見一位出身相同的人，已經使我感到幸運了」、「我再遇見她，像命運使然，我像回到了童年，也認爲童年遊伴的她才是我一生真正的朋友和遊伴」(236)，而在相邀出遊後，賴哲森復又如此形容：「從這一次的遊玩遭遇，我整个人生都改變了，同時了解她(我永恆的愛人)是怎樣的一個與我相同命運的不幸女人」(237)云云，須注意到這些冠在阿蓮身上的形容詞：「出身相同」、「命運使然」、「回到童年」、「一生真正的朋友和遊伴」乃至「我永恆的愛人」、「與我相同命運的不幸女人」等等，可見在生命交叉口上，「阿蓮」不僅是一個偶然現形的女人，在醫療歷

¹² 同前註，頁 285。

¹³ 同前註，頁 287-288。

程上，「她」顯現為賴哲森生命此刻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她是自我生命陰影的外在顯露。如上文羅洛·梅所說的：「人的體悟，可能包括了覺察諸如童年時期業已遺忘或埋藏的事物，以及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所湧現的『深層』經驗。」與阿蓮的相遇，正是對已埋藏久遠的童年過往之聆聽¹⁴；與阿蓮的同遊，亦便是一個重返內在深層經驗的歷程。作為賴哲森命運之化身，「阿蓮」正是他擺脫不去，也需要去聆聽、連結的「永恆的愛人」，透過「她」，賴哲森可重啟與自己、世界的對話管道，這正是他此刻必須面對的命運課題。賴哲森如是說明他與阿蓮的共同點：

……她與我都有一個共同的因素，雖然誕生下來的這塊土地是屬於我們的，但和她都過著流離顛沛的生活，得不到溫暖。(237)

從「聖母醫院」到「精神病院」，賴哲森一直在遭受著無法認同、覓無居所之苦。如此看來，「阿蓮」於此際現形於賴哲森眼前，正是無家可歸的漂泊者賴哲森被要求與內在深層經驗聯繫的起點，與阿蓮的相遇事件看似偶然，卻是必然性的，此一事件涵藏著賴哲森醫療的契機。

賴哲森巧遇阿蓮，不久便邀引一起出遊。將此段旅程視一段重返內在深層經驗的歷程，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注意，首先，賴哲森與阿蓮的相遇、出遊被描述為一段離開「城市」，到「海濱」尋求「家」的旅程：先是賴哲森對阿蓮提議道：「為何我們不到遠一點的地方去；離開這個城市」，阿蓮答之：「好的，越遠越好」(238)，而當他們沿著海岸線抵達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小村莊中，賴哲森如此形容荒落的景象：「簡陋、紊亂、骯髒都遭到內心的卑視，這就是我們。這些景象清晰地使我憶起童年的家鄉，像看到自己裸露般的羞愧」，於是他向她宣佈：「真正的漫長的旅途才開始」，而面對著眼前似無路的景況，阿蓮則對他說：「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朝盡頭凸立的岩石走去，以外便不再有何希望。」(240)，兩人繼續往前走，至黃昏，眺望山坡處，看到沐浴在夕陽紫光中的一片密集民舍，遂「心中除

¹⁴ 此一隱喻在兩人的相處狀態中充分顯現出來。如小說對兩人的初次約會之描寫，賴哲森如此說道：「從開始我便感覺她沒有遊玩的喜躍表情，事實上，後來我才知道她的外表永不會告訴別人她內在在想些什麼。我憶及她在童年為後母責打後的那番靜默呆癡的樣子，我呼叫她時她總不會答應的，直到後來我不注意她時，她才慢慢的靠近來。」(237)「阿蓮」的過往經歷使她成為一個沉默的人，這亦是賴哲森內心世界的隱喻，然也因「阿蓮」所隱喻的賴哲森之生命陰影／命運之沉默，因此需要賴哲森細心傾聽。

了喜悅不再存有任何憂懼」(241)，這段歷程的「尋找家園」之隱喻意十足。其次，賴哲森與阿蓮的出遊既被描述為一段尋求「家」的歷程，則此段旅遊完成之後，兩人共組家庭的意願自然被帶出。小說如此敘述——旅行之後，阿蓮投靠至賴哲森於北市租賃的破舊小閣樓，兩人同居、互獻，而後果然迅速地決定「結婚」。小說如是寫道阿蓮投靠賴哲森的情景：

……我跪下來把羞坐在牆角的她摟在懷裡，她在飲泣中想解釋些什麼話，我阻止她。「什麼都不必說，阿蓮，我異常清楚，我倆命定要永遠綁在一起了。」

一生之中，再沒有比這一刻更衝動著想要以一件事實行動來安慰一個軟弱的女人，我和她討論後的結論是馬上結婚。雖然結婚的形式早在我的心中已經喪失了意義——這緣於和丘時梅女教師的戀情在最後時突發的邪念。可是既已脫離那個環境和時間，現在與阿蓮的相愛在心裡上不免在做完互獻的儀式後，猶存在著一種孤獨的寂寞，所以為了把兩顆心綁在一起，當然就得託藉一個外在形式。(243)

以及「結婚」儀式所透出的強烈暗示：

我付了錢給伸手過來的那兩個當介紹人的男人。我摟著她奔出公証處，那個司法大廈門前的廣場忽然滾捲著一陣一陣帶沙的風，太陽被飛奔的亂雲遮去，整個街市灰暗下來。她的頭紗幾乎為捲風帶去，我的眼睛含滿刺痛的沙粒。我擁她避進一部計程車，吩咐朝三十七路駛去。在車廂裡，我再度擁她入懷，在我因沙粒沾眼而淚珠外滾的模糊眼視中，發現整個下午都十分沉默的阿蓮，竟然在此刻淚流滿頰，回到孤樓，隨著當夜便來了一場暴風雨，幾乎要把整個如鴿屋的樓閣捲去。……(245)

對賴哲森言，在生命長期的顛沛流離中，「結婚」作為一個「外在形式」，被賦予了撫慰寂寞，並防禦世界風沙的「家」之喻意。然而，細讀以上引文，卻仍讓人隱約感覺著不安，主要是賴哲森自己所透露的：「在做完互獻的儀式後，猶存在著一種孤獨的寂寞，所以為了把兩顆心綁在一起，當然就得託藉一個外在形式」；至於婚禮後與阿蓮的返家過程，也像是某種末世逃難的情景，「回到孤樓，隨著當夜

便來了一場暴風雨，幾乎要把整個如鴿屋的樓閣捲去。」孤立於世界，蟄居於破舊小閣樓中，如此的婚姻基礎是否真能建造堅固的「家」？能否醫治生命的顛沛流離之苦？第一卷末後，兩人的新婚生活被如此描述：

在那個溫暖的小天地裡，聽著雨聲在窗外，屋頂和陸上浙瀝地下著。她沒有想到外面去，所以沒有打扮，我似乎不洗臉和留長髮已經習慣了。我們讀故事書（我一生之中感到此刻的時間最充足），聽音樂和做愛。我們如此親密，如此赤裸，以致於我漸漸探測到她的內心深埋著昔日的創傷，所給她的不良影響（我也洩露了我的一份）。她在做愛時，總會哭泣，我要她忘掉過去，面對現實，她才停止了這種傷泣。如此一星期為雨水所困，我倆都變成骨瘦如柴，面孔蒼白，頭昏眼花，倦怠和軟弱的人鬼了。(245)

不過一星期的婚姻生活便成為倦怠和軟弱的人鬼：賴哲森的病況愈沉，阿蓮總是哭泣，如此看來，「結婚」真的把兩人緊緊綁在一起了，但這緊緊綁在一起的：聽音樂、讀故事書、做愛、赤裸……卻仍只是一個「外在形式」，寂寞依舊，焦慮依然。賴哲森要阿蓮「忘掉過去，面對現實」，但人如何「忘掉過去，面對現實」？作為「醫療」的隱喻，賴哲森要怎樣才能與阿蓮從「外在形式」進入心靈內在的「結婚」？「家」的醫療寓意為何？

第一卷末後，賴哲森又赴精神病院求救，且說道精神醫師「為我乾枯的形容所驚，以為我已經病況嚴重，面臨瘋狂的階段」(245)，無法躲藏於「外在形式」的賴哲森，終於被逼著誠實道出過往記憶：「至此，我顯然無法再遁形逃竄，我便把所有埋藏在心底的事（那兩年在小鎮所發生的事）向陳醫生做了一次坦率的陳述」(246)。然而那「致病」的內在深層經驗究竟是什麼呢？

三、致死冷漠之病：無愛的馬束小鎮

在生命意向性的治療中，須真正地觸及「致病」的內在深層經驗，才有醫療的可能。第二卷開始，如人鬼般的賴哲森，終於打破護衛的藩籬，向醫師坦承道出他昔日生活，以及令他患病的癥結：與「丘時梅」的往日戀情。¹⁵事實上，從賴

¹⁵ 小說寫道，賴哲森所以一直未能對醫生道出隱埋的往事，是因為他一貫地對人的不信

哲森尋求治療以來，這段不堪回首的愛戀往事不僅未能在他刻意的壓抑下銷融無形，反而時時現形於他尋求醫療的過程中。如賴哲森在聖母醫院時，他便在身型高大的義籍修女身上看到了丘時梅的身影（231）；而作下與阿蓮結婚的決定，亦緣於與丘時梅戀情的受挫之補償（243）。因此若賴哲森此刻所面對的「醫療／結婚」之問題蘊含在這一段愛戀往事中，那麼，「丘時梅」之於賴哲森的意義何在？這段愛戀往事為何成為賴哲森身上的沉重之病？

「丘時梅」是任小學教師的賴哲森抵達馬束小鎮時，在新舊校長交接餐宴上所認識的同校女教師。小說如此寫道丘時梅給賴哲森的感覺：

……丘時梅有一種為我熟識的風姿；她的模樣彷彿我童年時代母親的象徵，和溫柔又堅毅的愛神典型。從她的舉動我想她一定把我看成一個不懂事，要人指導一些生活事務的兄弟這樣地待我，所以她坦落的善意自然地消除了陌生的距離。（248）

若說「阿蓮」是七等生小說中常常出現的，代表某種出身卑賤、柔弱堪憐，且需要人去看護拯救的女性典型角色；則小說中另一常見的女性典型，則是如母親一般，照顧男性主角，給予安穩力量，甚且指引其朝她前行的母親、女神般的角色，如「丘時梅」便是。¹⁶從作為童年友伴象徵的「阿蓮」，回溯至與母親象徵的「丘

任。賴哲森如此說道：「我對以上的幾位精神醫師所做的不坦率的行為認為是根本就是在拖延時間。第二面，我的確太羞於把自己的事公佈出來。面對著他們，像面對著我們生活十分接近的鄰居一樣，由於大家太坦率太了解反而沒有一絲安全和獨立感，這是我沒有正確的觀念建立起醫師（尤其是精神並醫師）的神聖高尚的地位，也懷疑這些人在現世中是否真正能積極解決病人的問題。自始至終，我總太過於自信地以為自己能夠護衛著自己，反正，這個社會呈露著一片自私，社會缺乏公正的維護，在如此潰散之下，個人只有依照著自己的想法活下去，任何人都是不可信任的。」（243）賴哲森長期於社會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是令其受傷與患病之原因，但因不信任而封閉情感，亦是令其病難以獲致醫療，且病得愈深沉之原因。可以說，與「阿蓮」的相遇與結婚，便是要去面對此一問題。

¹⁶ 在七等生小說中，如此的女性角色（理想女性）常常扮演男性主角生命意向之導引者，使他的生命旅程得以朝向某一具體方向展開，如在七等生的長篇小說《城之迷》（1977）中，這個意念被闡述得極為清晰。小說中，七等生讓主角柯克廉表述此一「理想女性」對於他生命意向的導引義：「他自認他的人生便是毫無償報地也毫無條件地要奉獻給他

時梅」之交往，此一朝向丘時梅（母親、母體）回歸的方向，顯現醫療歷程上，賴哲森正一步步地探入與世界交往的更內在、更本源之關係中。

小說寫道，年輕教師賴哲森抵達馬東鎮的小學之日時，學校正逢新舊校長交接歡宴的時刻（247），宜特別注意這個「新舊交接」的時間點暗示，這是一個渾沌未明的變動時刻，而在交接宴會的場合上，同校女教師丘時梅招呼新來的賴哲森，且邀請尚未覓得居所的他暫宿在她家的空樓上，如此的敘述開頭，已經帶出「丘時梅」之於賴哲森的重要意義——對初來乍到且急需覓得居所的賴哲森言，「丘時梅」是他在變動現實中，提供「家」的安穩感受之重要女性，因而第二卷中，賴哲森在馬東小鎮的生活，遂被描述為一段「愛戀丘時梅」的生命歷程。羅洛梅於《愛與意志》一書中，曾以「愛慾」（eros，或譯為「愛」、「愛洛斯」、「愛神」）一詞來說明「愛」之於人類生存，與存在意義的重要性，很值得參考：

愛慾並不是位於人之上的神祇，而是將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結合起來的力量，亦即賦形(informing)於所有事物的力量。「賦形」(in-form)……它指的是賦予一個內在形式，以全心的愛尋找至愛之人或所愛之物的獨特形式，並使自己與此形式融合。……透過愛慾，我們不僅成為詩人、發明家，更臻於道德上的良善。以「愛慾」為形式之上，是一種源源不絕的創生力量，

理想的戀人，這個意志無疑一步一步導致他為人類承受情感的折磨。他為這種美感生活，也為這種美感受苦。」以上說法幾可視為七等生小說中男主角的共同心聲，具有導引生命方向的崇高意味。如《城之迷》中的柯克廉在表達此一意志後，面對裴梅（便是此一理想女性）的質問，他如是回應：「我的意志是願望追求一位理想的女人。」而當裴梅說：「世界根本沒有你想像的那種理想的女人，我認為你的願望最不能實現。」柯克廉又答以：「這個願望如不是以女性的形姿出現，我亦希望它能充分的表現在我的意念裡成為形上的事物。」「形上事物」、「美感生活」的二合一可視為七等生筆下此一「理想女人」的隱喻，而所謂的生命目標，便是朝向此一方位的追求。然而要注意的是，七等生筆下的「理想女性」往往生存在城市（俗世）中，要不便正在被城市眾人看管著。如《城之迷》中裴梅告訴柯克廉：「白馬出沒在城裡，你所要追尋的理想女人也在城裡」，可見「理想女性」已不僅是某種靜態目標的形象顯影，更動態性地呈現為一種導引追求的實踐動能。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在《城之迷》中的柯克廉之思考獲得映證，當裴梅問：「你自信會找到你理想中的女人嗎？」柯克廉答：「有沒有理想的女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尋找的途徑。」可證「女性」之於七等生小說的隱喻意。引文分別見於「七等生全集（6）：《城之迷》」（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頁6、74、99、83。

而這樣的創發意味著「一種永恆與不朽」——意即，這樣的創造，使得人類以最大的限度，接近不朽。¹⁷

以及：

……愛慾，它是存於人類內在對完整的渴望，它驅使人賦予多樣性以意義和型態，給予令人耗竭的無形性(formlessness)以形式，並帶來統整性，以抗衡我們崩解的傾向。……

亦是愛慾，驅使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們逐漸好轉……愛慾中總是含有一股令自我向外延伸的力量，一種持續回充的衝動，驅使人奉獻自己，永無止盡地尋找真、善、美的更高形式。古希臘人相信，持續不斷地重新創發自己，乃是愛慾的固有本質。¹⁸

因此不可僅以一般的男女之愛來看待賴哲森與丘時梅的愛情，從「醫療」的隱喻來看，賴哲森對丘時梅的愛戀指向的是更內在的「愛慾／愛」問題：「丘時梅」是賴哲森與世界相互影響的通道，透過「愛戀丘時梅」，賴哲森可以與自我、他人連結，這是他生命力湧動的源頭。「愛慾／愛」既是如此重要的生存課題，我們要進一步問的遂是：作為現實世界的隱喻，「馬東小鎮」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賴哲森為何無法在其間實現愛慾理想？

（一）世界表象下的鬥爭本質：抗爭或疏離？

不妨先來看賴哲森與丘時梅同處的學校。前文提到，賴哲森初到小學時，正值新舊校長的交接時刻。新校長梁啓川上任之後，便迎來學校新一波更大的權力角力戰，整個國校在被粉飾的教育口號下，上演著一幕幕赤裸裸的鬥爭戲碼，無人可置身事外，賴哲森與丘時梅亦然。

將學校生態視為現實世界的縮影，我們注意到，賴哲森是以鬥爭性來呈現他眼中所見的校園人事，舉凡：舊勢力的頑固反撲、金錢利益的輸送交換，以及同事之間的唯利是尚、見風轉舵、易受煽動、不辨是非與成群結黨……等等分裂景

¹⁷ 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頁 94。

¹⁸ 同前註，頁 101。

象構成他生存的陰暗背景，人事傾軋中，如此失卻理想的現實世界亦便是他所要賴以茁壯，實現愛慾的生存舞台，然而此一在賴哲森眼中看來墮落不堪，而不願與之同調同舞的生存舞台，卻是一般人視為正常的世界。如此，生命的重重鬱結遂把賴哲森置入於一個如何統整現實碎片的巨大難題中。

以教育環境隱喻現實世界，一直是七等生小說所著力書寫的主題。小說家每每於其中勾勒出隱藏在所謂「正常」表象下的種種不堪面貌，且以此為背景舞台，從中帶出一個出身卑微的（以自己為摹本的），不能與社會諧和，飽含時代悲淒感受的（藝術家）形象來，〈精神病患〉中的「賴哲森」便是此一寫作主題下的典型角色。陳國城（舞鶴）曾如是說明作家賦予此類角色的重要涵義：

七等生於他的某些小說作品中，曾經處理了一個重大的主題，就是「自我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衝突、對抗、消長及價值抉擇的過程……外在環境可能是「正常的」、「合理的」，問題在於除了現實世界外，還有另一龐大的「自我世界」的存在；衝突及對抗的產生由於二者彼此不能調和，更貼切地說，「自我世界」的發展脫離了一般常軌，向更深邃的、神祕的境地延伸，自然不能與正常的「現實世界」諧和；並且因為此種不能諧和，衍生另些人生重大問題的迷惑，建構成一龐大的矛盾的鬱結。七等生小說作品中的一個重大主題，便是企圖處理此一矛盾的鬱結。¹⁹

作為一個懷抱著「自我世界」，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又身價卑微、孤立無援的青年，²⁰賴哲森回應種種鬱結衝突的方法便是：漠視抽離，亦即讓自己成為一個不合

¹⁹ 見舞鶴：〈「自我世界」的追求——論七等生一系列作品〉，收錄於「七等生全集（4）：《離城記》」，（同註五），頁341-342。

²⁰ 如此的角色被呂正惠稱之為「社會棄子」，呂正惠以為此類角色的塑造，正是七等生「王國」建立的「秘密」。本文以為，「社會棄子」的思考可以提供我們一條理解賴哲森所以成為一個「精神病患」的有效進路。呂正惠說道：「七等生可說是下層知識份子的『典型』；他的出身限制了他的發展，他的敏感讓他知道自己的命運，他的命運使他對社會產生深刻的敵意，從而把自己從社會疏離出來，把自己封閉起來，然後在自己的思想意識所建造的哲學王國之中自封為王。七等生是下層知識份子的『極端發展』，他成為這些知識份子沒有出路之中的一種『出路』。他是他們的主觀的代言人，是他們主觀世界的『精神領航人』。這是我所了解的，七等生和他的讀者的『秘密』。」見呂正惠：〈自

群、不合作的疏離者／邊緣人的存在。²¹尋求聖母醫院治療時，賴哲森曾自言：「我便藉著一種漠視一切的感情恢復了平靜，我總是憑藉這類的感情排除一切不能解決的內心的阻難」(228)，漠視是賴哲森隔離現實以緩解衝突的方法。然而問題是，對初入社會、初到小鎮的賴哲森言，成爲一個旁觀的疏離者／邊緣人，是否便能安然守住一個不受外界侵擾的「自我世界」？抽離了現實世界，他的愛慾理想如何實現？以漠視來壓抑著自我表達之需要，是否亦將會讓自己陷於日愈無能的焦慮困局中？

(二) 婚姻表象下的冷酷本質，突圍或被包圍？

退避了校長與教員群體間鬥爭的賴哲森，其傾注熱情與找到安寧的方式便是與丘時梅交談(261)，丘時梅待賴哲森如家人，他每天到丘時梅家與她及丈夫陳蓋文一起晚餐，享受著家庭生活的安適感，隨著賴哲森與丘時梅的交往愈加親密，賴哲森亦一步步地進入她的婚姻生活，更深地認識了她的丈夫陳蓋文，而若說學校的複雜人事尚有容許他迴旋抽身的空間，在這段愛戀關係上，爲親近丘時梅，他便不能不關注她與丈夫陳蓋文的婚姻。

第一次到丘時梅家的賴哲森如此說道陳蓋文給他的印象：「他是碩壯中等身材、帶著學養氣味的男人。但他給我的印象是冷漠和傲矜。」(247)，陳蓋文是一位高傲、寡言、嚴肅、冷漠且常常在晚上外出刺魚的男人，賴哲森對他抱著敬畏的心態，但二人之間如隔著一道高牆。直到一次陳蓋文因接獲父喪消息，忍不住流露悲傷神色，之後丘時梅因擔憂葬禮費用，而將丈夫的過往與他一一道來，陳蓋文的神祕面紗才被揭開：作爲家中次子，自小得不到父親注意，卻想讓父親刮目相看的陳蓋文一直在尋著各樣的出頭機會，與丘時梅結婚不久，他原本看似誠樸的性格更開始轉變，偷偷辭去死板的工作，與人做生意，不久更走上投機冒險之途，散盡丘時梅帶來的珍貴嫁妝，甚且不再回家。兩人後遭陳蓋文父親驅逐，時感屈辱的陳蓋文更「出入賭場、睡在旅舍裡，與流氓往來，找尋妓女玩樂。」(257)，而後更要孤注一擲，丟下丘時梅一人冒險南下，直到七年後的一日，丘

卑、自憐與自負——七等生『現象』》，《文星》第114期(1987年12月)，頁118。

²¹ 這裡我們可以合理地揣想，七等生對賴哲森性格特色的塑造，除了有相當程度的自我投射外，臺灣六〇年代的存在主義思維下，帶著「疏離」特質的異鄉人角色，也是現代主義文學常常會著墨的一種人物類型。

時梅接到一通求救電話，趕赴南市的一家旅社，發現丈夫被一群賭徒包圍，她付了贖金，換回一個丈夫，但卻從此是一個冷漠無感的丈夫：「他固執地堅持不為這個世界再做任何事情，他唯一生存的辦法就是像原始人一樣自食其力刺魚為活。他變成一個十分沉默和嚴肅的男人，雖和她的家族同在一個屋蓋之下，卻難有歡笑和愉悅。他整夜在海上，沿岩石海岸刺魚蝦。」(259)，陳蓋文讓自己退化為一個與世隔絕的原始人存在。

我們宜注意陳蓋文生命發展的意義。陳蓋文所以成為如此一位寡言冷漠的人，竟是無法處理他生命中的重重鬱結所致：長期以往，陳蓋文一直以獲致父親肯定與現實榮耀來肯定自己的存在，因而一旦遭遇徹底的失敗，陳蓋文遂轉為以否認、漠視自己需要的方式來逃避無能感的侵襲，而成為一個阻絕現實屈辱，同時也拒絕參與情感的冷漠之人。然而那被強加壓抑的需要豈就如此消失無形？它早已悄悄地滲入陳蓋文難以察覺的潛意識暗區，並轉為他整夜沿岩石海岸刺魚蝦的暴力。陳蓋文身上體現出一個現代人如何淪為一個失卻感受的冷漠之人的歷程。他已斷絕與世界的交往，甚至是面對自己的妻子：當丘時梅將可能流產的訊息告知他時，他的反應卻極淡漠，「好像有沒有孩子，或危險不危險均不在乎。」(262)，丘時梅轉而找賴哲森陪她到醫院，當賴哲森回來向陳蓋文告知她的住院消息，作為丈夫的他卻神色鎮靜，「照常到海上去」(262)；最後，丘時梅流產了，陳蓋文甚且在妻子一動完手術便離開了(263)。丘時梅如此述說丈夫陳蓋文的形象：「他的遭遇已經足夠使他成為一個冷酷的人了；他是個帶著滿臉滄桑回家的男人，他對任何事都可能顯露麻木、他逃避著，甚至掩飾著，只關注到他自己堅持的生活方式。」(263)

體現在陳蓋文身上的冷酷、麻木、自私，正是愛慾斷絕的表徵。一如賴哲森所欲逃離的現實世界，原來在如此一個貌似正常的「家」中，丘時梅與陳蓋文的「婚姻」亦是一失去內核的空殼。此一真相使賴哲森深感恐懼，因此若不欲步入陳蓋文後塵，賴哲森必然要做出突圍的選擇與行動。賴哲森對丘時梅提議：「那麼我們遠走高飛，拋開一切既往」這是賴哲森突圍的渴望，但現實面緊跟而來，丘時梅拒絕，因「她不能在這樣的社會以那種理由和她地丈夫離婚，況且是她要他回來的。」(264)如此看來，至此刻，賴哲森對丘時梅的傾吐愛意與追求，已具體化為一個「如何繼續在馬東小鎮生存」所意味的「如何存活於世？」之切身課題。賴哲森說道離開醫院的自己：「淚水奪眶而出，寂寞和愛與恨包圍著我，我的心已經夾碎滴血」(264)，現實的失敗與屈辱讓陳蓋文走上一條斷絕愛慾(生命力)

之路，然而賴哲森呢？馬束小鎮依舊以其正常的表象運轉不息，然而窺伺了表象下的冷漠真相後，賴哲森如何繼續面對自己、丘時梅、陳蓋文與整個馬束小鎮的人？

(三)性慾望下的暴力本質，親密或恐懼？

從愛慾的角度看賴哲森於馬束小鎮的生活，事實上，整個第二卷的敘述便是以賴哲森與丘時梅的交往關係展開。然而如上文所說的，隨著愛苗的滋生，愛意的互遞，要能與丘時梅維繫住穩固關係，賴哲森便無法繼續以局外人的姿態生存在馬束小鎮中。在「如何繼續在馬束鎮生存？」的課題下，令賴哲森深感恐懼的，除了陳蓋文的陰沉個性外，更有整個小鎮的特殊氛圍：那是一股驅之不去的，性的騷亂氣味，倏忽而來忽焉而去，無人可免於騷亂氣息所釋放的警報中。

作為現實世界的隱喻，在看似正常的馬束鎮民的生活中，唯一讓沉悶的生活甦醒起來，且吸引大家的目光與話題的便是街頭巷尾所竄出的一則則性醜聞，出人意料或如人所料地令大家觀看、評論著。小說如此透露小鎮的人情網絡：

冬天裡，這個小鎮唯一有趣的新聞便是西藥房的女老闆與一位城市騎摩托車來的藥品推銷員的姦情觸怒了那位沉默的贅夫……那位平時沉默，工作賣力的男人把他驕傲美麗的妻子從藥店裡拖到走廊上來，拍打她的臉頰，憤怒地撕裂她的胸衣，脹紅著面孔咆哮著要圍堵的人們注視這個賤婦。那張平日花粉的誘人面孔，從朱唇濺流出口沫，與淚水混塗在脖子上，這個情景給人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關於這位風流的女人在白天公開地和推銷員的姦情，鄰里間早已傳聞多時……（253）

再看馬束小鎮的另一角落，亦是荒謬的一例：

一位矮胖獨眼的婦人，脫下了她腳下的木屐，高舉著它，把她當農會總幹事的瘦丈夫，由婦女會主席的家中連打帶踢地罵出來。她自己的臉頰上印著那位碩壯時髦的婦女會主席的巴掌痕跡。這件為時已久的淫蕩之事，終於演成一幕憤怒的戲劇高潮。那位如猴子一般模樣的人，在被捉姦之後在街道上鼠竄著，赤著腳，未穿上衣。（265）

在看似正常實則扭曲的馬束小鎮中，身處其中之人，不論是丈夫、妻子、情夫、情婦，乃至圍觀群眾，小鎮中的所有角色都錯亂。粗鄙、欺凌、鼠竄，這是一個有性而無愛的小鎮，小鎮群體的生活顯現為一幅內在枯竭，無能感受的分裂景象。他們一如「精神病院」中的「精神病患」們，不同的是，這裡不見「精神病院」可見的高牆，但卻不乏人與人之間一道道難以跨越的藩籬；不同的是，這裡沒有「精神病患」，但卻充斥著一個個交出自由意志的「正常人」；不同的還是，這裡沒有醫護人員的規訓與懲罰，然而人人皆自動內化為無感僵化之人。這馬束小鎮一如「無形的精神病院」，在此一「無形的精神病院」中，人們僅循著「性」的原始氣味進行種種淫蕩的想像，藉以打破小鎮的沉悶無聊。²²而當「愛慾／愛」被化約為「性慾／性」，²³流竄在鬧劇般的性騷動下的，便是一汨汨被漠視壓抑的慾望潛流，等待噴薄而出，衍成暴力的毀滅洪流。來看羅洛·梅對冷漠、暴力與性之討論：

……當內在生活枯竭，感受不再而冷漠愈增，當人們無法影響，甚至根本碰不著他人時，暴力之火便驀地延燒成惡魔般的接觸渴望，逼得人要以最

²² 可再看一例：一位旅舍中的妖豔女侍，為了供養她在城市中的情夫，而向一位迷戀著她，但已有家庭的警察索取媾合的渡夜資，小說寫道這位愚迷的警察則如是對待他的家人：「冷待妻子，責打子女，二十年來，每月把薪水全部交給妻子的溫良習慣也中止了。有時，他的同事見憐那位在家忍氣吞聲的妻子，把他從旅社勸回來。他回到家裡，脫下了上衣，等候他的同事告退了，他再穿起衣服，一面責罵妻子，一面再踏出門去。上星期，他的妻子已不堪忍受如此虐待，攜了最年幼的小孩出走而不知去向了。」(261)

²³ 羅洛·梅如此說道：「古希臘人也十分明瞭，愛慾總有被化約為單純性慾望的傾向——他們稱之為淫慾(*epithymia*)。但他們堅信，在愛慾中，生物性層面並未遭到否認，而是被融併在內，並且被提升……」見《愛與意志》，頁102。在「愛慾」之中的「性」才具創造力的特質，如羅洛·梅於《創造的勇氣》便說道被融併在愛之中的「性愛」：「性愛比喻確實顯示了遭遇的重要性。在性愛活動中，兩人互相遭遇；他們遷就彼此以便融合為一，體驗已知與未知的每一點細節變化，希望能夠重新認識對方。……性愛活動是兩個生命之間最密切的結合，也代表了最充實與最豐富的遭遇。更有意義的是，此一經驗也是最高形式的創造力表現，因為它可以誕生一個新生命。」，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傅佩榮譯：《創造的勇氣》(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版)，頁104。而馬束小鎮的「無愛之性」正是愛慾被化約為無生命力的性慾之象徵，這頗似我們當代社會的情況。

直接的方式瘋狂地貼近他人。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觸發性慾與暴力犯罪之間關係的因素之一。²⁴

「性」傳達出人們意圖接觸、打破僵滯冷漠的訊息；然而在感受被阻絕的大地上，如此的性騷動又被演成一齣齣等待著被人／將人送上斷頭台的瘋狂戲碼，直接施以身體的鞭笞懲罰。威脅臨至，連賴哲森也不例外。與丘時梅互表愛意之後，亦正是賴哲森飽受暴力威脅的開始，賴哲森說道：「我總是害怕，我不自覺地幻想她的丈夫手中的魚鏢像他刺魚時的憤懣刺進我的胸膛。凡是像這樣的事都會有一天洩漏出來，沒有喜樂的結局。」(265)，愛與恐懼、壓抑與渴望雙雙夾逼著賴哲森，然而他是寄存於學校與馬束鎮的邊緣人、疏離者，他無所奧援，亦不願與人們為伍。更嚴重的是，一心意欲與小鎮區隔的他，反而遭致被小鎮包圍之命運：

……晚上我不再常到丘時梅的家中聽音樂，我整夜地在沙灘散步，甚至整夜地寫著一些亂語。我開始對教學倦怠，而羞於和我卑視的人為伍。與這極端不同的是一度平息下來的情焰，現在熾烈地復燃起來，高漲著沒淹整個心身。我渴望著有一個可以取到手的愛的對象。但是，這個小鎮除了丘時梅以外，再找不到其他滿意的女人。兩年來，我習慣在清晨蹲伏在豬舍僅隔一面短牆的窄小廁所裡，我冷靜地思考，當那隻豬的前蹄搭在短牆，沾滿黃色渣汁的龐大嘴巴在我的耳邊嗚唔，與糞便落入於流著一股湍急的水流的暗溝之時，我不禁掀起一股賭咒我身處此境的憤怒。(268)

極為形象化的描述。致命的空虛，性的誘惑如此臨近自身，渴望以身體的碰觸破解荒原的咀咒，但找不著突圍之道，只能將此一慾望再度壓抑入身體的極深暗流中，在如獸如糞般的處境中憤怒掙扎著。數日後，丘時梅到賴哲森宿舍邀請他，不意看到了賴哲森床褥下藏壓的一本《男女性行為》的盜印本，如此書名宣洩了賴哲森的秘密心事，此刻是他生命的危急存亡之秋，被圍困於馬束小鎮的他正在為此恐懼、煎熬著，也正在為此而掙扎、奮鬥著。他如是自陳：「不可諱言地我是以這本精印著美妙的照片的書籍在排遣晚上這段窒悶的時光，分散我對這個充滿淫亂、粗暴、不神聖和失掉真理的小鎮的憎惡。我甚至不能逃避一個幻覺；好像

²⁴ 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頁26。

我走在那一個角落，都會有突向我攻擊的恐怖的埋伏。」(269)，丘時梅轉身離去，賴哲森終於忍不住衝向她，從身後抱住她，「手指正好落在她前胸的胸乳上。經過這一觸動，彷彿我平日渴望的幻想實現了，由手心傳來一股從未有過的狂潮。」(270)性的渴求，身體的衝動，訴說著人在極度寂寞中的吶喊——渴望透過與所愛之人的直接碰觸，粉碎令人窒息的死境。但丘時梅驚訝著奮力掙脫，轉身逃開，畢竟這裡是被冷漠與暴力所詛咒的馬束小鎮，她是被全體鎮民與丈夫所看管的丘時梅，她恐懼地對賴哲森說：「不要，起碼不能在這裡……」(270)，但除了馬束小鎮，還能在哪裡？丘時梅離去，賴哲森與小鎮/世界的最後一絲聯繫斷絕，他又成了一個無家的飄泊者。第二卷末後，盲無方向的賴哲森一人走向黑夜的沙灘，隱約感到身後一群人影的跟隨，在疑惑與恐懼的氛圍下，轉身，一群要置他於死地的年輕人已把他包圍在中央，「殺死他！」(271)暴力已從四面八方逼臨至身，無路可退。²⁵不斷受到重擊的賴哲森把身體整個撲倒在冰冷的海水中，游向茫茫之海中，直到「他們斷定我已經淹死了，才開始離去沙灘。」(271)，然而以死狀騙去眾人眼目的賴哲森畢竟活過來，且離開馬束小鎮了。而這個活過來且離開馬束小鎮的賴哲森，便是那個走向聖母醫院尋求醫療的賴哲森，亦便是那個與阿蓮結婚後依然如人鬼般，懇求醫師將他從死境中拯救出來的賴哲森。

四、醫療內的真實：疾病便是「人與自己、世界的關係之病」

馬束小鎮愛的幻滅，點出了變動社會中現代人的生存畸狀／病之課題：這世界一如無形的精神病院，它是一片看似正常，實則愛慾斷絕的冷漠土地，人與自己、世界無法／無能溝通聯繫，愛被性所篡奪，在每個無能感受的人際空虛裡，一隻隻張著血盆大口的暴力巨獸等著將人吋吋吞噬。然而賴哲森在如此一番死亡的歷險敘述後，依然要回到現實此刻，更甚者，他已被帶到如何將自己從瀕臨死境中拯救出來的課題前，如此緊迫，無處可躲。面對著眼前展開的未來，賴哲森懇求醫生：「你能幫助我嗎？」，然而醫師所開立的處方竟是：「你只有面對現實」、「這個社會沒有賦給我醫治病痛之外的權柄」、「我無能為力」(272)的答案，這既殘忍又具智慧洞見的回答——賴哲森仍得自己獲致醫療處方，他必須為自己的

²⁵ 小說雖然未明言追殺賴哲森的年輕人是被誰驅使的？但就小說線索尋之，賴哲森在學校曾與代表鎮長勢力一方的同事起劇烈衝突，因而極可能是此原因所致。

疾病／醫療負起責任來。

在前文中，我們曾提及「意向性」作為醫療歷程的意義，那麼，從現在回返過去，再從現在面對未來，娓娓道出潛抑的致病記憶後，賴哲森是否便能讓自己從「致病的過往」邁向「治癒的未來」之路？賴哲森的醫療歷程如何繼續展開？在這一片冷漠大地上，愛慾究竟存在何處？它如何顯現自身？作為醫療的隱喻，告別了與丘時梅的戀情，賴哲森能真正地與「永恆的愛人／阿蓮」同行並結婚嗎？這個命運課題的內蘊究竟為何？承上文所提問的，從外在形式到內在涵義，什麼是「真正的結婚」、「真正的家」？

（一）我要扮成一個什麼角色？——理想與責任的衝突

婚後，在賴哲森的主導下，二人如此生活著：阿蓮在特產店當店員供養家計；賴哲森則到大學旁聽哲學與藝術的課程，並專心他寫作的志業。但不久，生命中的「新舊交接」時刻便來臨了：阿蓮懷孕了。在醫療歷程的隱喻上，阿蓮懷孕的過程顯現著一連串的重要訊息：面對變動，賴哲森首先的反應是維持生活現狀，故建議阿蓮墮胎，但面對醫師時的難以啓口，兼諸醫師的勸說，遂又為難地將胎兒留下。懷孕的前幾個月，賴哲森還能與阿蓮維持既有生活方式，但想到孩子降生以後所可能遭遇的經濟問題時，「憂患常佈滿整個黯淡狹小的樓上」（274），最主要的問題是賴哲森與阿蓮勢必無法再保留現狀的生活，而他以為：「我必須對學識一事持續著恆心」，幾番折衝思索，「認識我的人勸我把高傲的骨氣消除一些」（274）」賴哲森決定去找一份廣告公司的工作，且獲得錄用。

可以說，變動現實中，對於堅持著「我必須對學識一事持續著恆心」的賴哲森言，將現實納入他的責任意識中考量，並從「責任」中看待自己所應當扮演的角色（雖然是旁人的規勸），已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步，這裡我們彷彿看到賴哲森試圖著打破舊我框架的努力。面對衝突，他如是自問：「我的抱負是什麼？我要扮成一個什麼角色？」（276），隨著胎兒的生長，他且不斷在衝突之中思考著，賴哲森說道：「每晚，我的手按在阿蓮隆高的腹部，觸聽胎兒的踢動，我心中隱伏著理想和責任的衝突。」（277），然而，便就三個月，三個月後，賴哲森還是隨著自己的意願拋開（背叛）了阿蓮，他向她表露要去拜訪一位心儀的作家，且欺騙她已向公司請假（後來且丟了工作），當天便會返回。但一離開卻是三天，三天後返家，阿蓮對他說的的第一句話便是她腹中胎兒不動了（277），而後檢查結果是死胎，且須立即取出，否則將危及阿蓮性命。

榮格(C.G.Jung)曾提出，精神疾病的發生絕非偶然，它的迫切性在於病人的生命遇到了一個臨界點，諸如婚姻、名譽、成就與金錢……等等，都面臨了新的調整、新的適應之必要，因而「醫療」必然觸及人格的整合與發展，「醫療」是爲了讓人重新在疾病的症狀中找回自我的本性²⁶，這也便是我們所說的「意向性」治療之意。因此，當我們將「懷孕」置於醫療的隱喻中，「懷孕」所意謂的「如何孕育新生命？」之課題，不正考驗著賴哲森可否在變動現實中，重啓與自己、世界之對話管道？然而小說中，賴哲森雖面臨著這一衝突，但在「我要扮成一個什麼角色？」的問題上，他終究還是逃開了，他再次逃回那熟悉的生命框架中，與那個漠視疏離的，舊有的賴哲森認同。如此看來，當賴哲森不具備因應變動現實之能力，或當他在衝突之際逕回舊我的框架，當他逃避了與阿蓮共爲家人所要面對的責任時，胎兒之死即是必然的了。將胎兒之死（一個待成長的生機之死）視爲隱喻，這次，甚至不是他瀕臨死境，甚至連他的妻子阿蓮亦被捲入其中了。然而，與陳蓋文不同的是，他是一個渴望從病中治癒的賴哲森，他渴望著突圍精神病院的高牆，因而對自己發出「我要扮成一個什麼角色？」的提問，那麼他如何回應這個問題？醫療曙光何在？

(二) 參與「取去死胎」的戰鬥

三日後回返。死胎。住院。阿蓮的生命正在被死胎威脅著，時間以生死拔河的具體樣貌現形，試將這段歷程較詳細地引錄其下：

當天黃昏，我和她都住進醫院。一切手續都辦妥後，我便一直守候在她的身邊。……，鐵架上吊掛的一罐倒置的泡沫水十分緩慢地流進她的腹內。從這一刻開始，她驚佈的眼睛完全落在我的臉上，向捉攬著我，要求平均分配苦痛。

……

午夜前她來了第一次腹痛……每一次，她的呻吟聲都召喚著我從沙發椅起身，依伴在她的旁邊握著她緊張的手。

清晨的時候，她的腹痛次數顯著的增加。……她的眉頭之間刻出一道痛苦

²⁶ 以上觀念，請見榮格(C.G.Jung)著，劉國彬、楊德友譯：《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精神醫學之旅」一章，頁162-197。

的痕跡，瞳孔張大著望著我。……

……

整個早上，她疼痛時不再握我的手了，她的雙手伸到頭髮後面緊緊捉住床頭的鐵條。我看著她的身體整個在床上扭曲旋轉，哀吟的聲音如利矛刺進我的心坎。……

……

……我又到街道的攤位去吃飯，已經下午二點半……我預感著，認為她會死去而懼怖顫抖起來。……我頓時傷心起來，啊，我要怎麼辦？假如她死去我便什麼也都失去了。……為什麼這一次我不能逃避？好像昔日如法懦弱地躲避那些可厭的人物一樣的去。……

……

……醫師又來檢查一次，護士推著輪床進來，再把她送進手術間。……一次又一次，她咬緊牙齒面孔脹紅，雙眼發射出無比逼人的痛苦的光芒……約有半個小時，那連著胎兒和母體的臍帶還不能脫掉。……血液一直汨汨地流出來。……他（按：醫生）使勁拖拉，好像一個雪人在做拉力運動……醫生的面孔因恐懼而變色，雙手震顫……我感覺我們勝利十分渺茫……我感覺我在此的彷彿一向我內心裡告訴我的那個渺茫的希望，冒著巨大的耐性守候，像一個歷程，讓我們慢慢受到折磨，讓我們付出連我們都不了解為何付出的代價。……他盡他的力量終於把它強硬拖拉出來，他終於讓一個生命舒舒服服地喘息一口空氣，他結束了他扮著我們的命運的一個戰鬥者，一個解釋著。他片刻的任務完成了，他不常常如此冒險的，他和助手們都很懊喪地推門出去（278-283）

令人不忍卒睹的痛苦。我們宜注意「死胎」被擺置的位置，它被置於一個隨時可能危及阿蓮生命安危的變動點中，隨著時間的點滴流逝，疼痛與無助一一滲出，死亡暴風襲來，死亡正在進行對阿蓮生命的掠奪，除了全力因應外，人無力掌控戰局。因此，從「死胎」到「取出死胎」，死亡的威脅下，這一路的敘述遂隱喻著人在死中求生存之奮鬥。痛苦便是戰場。我們要特別注意小說以「時間」帶出的敘述軸線：黃昏、午夜、清晨、早上、中午、下午，再到黃昏，時間的推移正是生死的消長，「取去死胎」即是在死亡的步步進逼下，「一起」挺身為「求生」所展開的一場戰鬥。

死亡勢力如此龐大，人有什麼條件可以參與戰鬥？阿蓮在哀號著，這一波疼痛過去了，下一波又緊隨來到，疼痛似有自己的意志，全然不理會人的請求，更無法被人所掌控，人如此無助，卻脫離不了戰場，只因為這便是生存的本身。過程中，賴哲森深感無助，說道：「現在隱隱約約知道失敗已經在未來迎接著我們，我們也無法逃避躲藏」一個極度脆弱的人終於現形了，這是被死亡揭出的命運真相，現代社會中，人以掌控世界的巨人姿逃避真相太久了。哭泣、疼痛、爭鬥、沒有保障，人力終有盡。賴哲森坦承：「我看到我們在命運之前低頭臣服，再沒有半點驕傲之色。」(279) 人非人定勝天之人，人是可被征服的有限之人，也唯人是有限之人，才能同情共命於生命的苦難、且撫慰陪伴，「家」的寓意在此呼之欲出。死亡使愛復甦，作為一個長期漠視世界的疏離之人、無家的飄泊者，賴哲森應可在參與阿蓮痛苦的「取去死胎」手術中獲致療癒了。然而當我們如此看待這段「取去死胎」的醫療歷程時，一如前文所討論的「結婚」之情節，我們仍有未安之處，因為在這段生死拔河的战斗中，賴哲森是致使阿蓮的胎兒變成死胎之人，但卻是由阿蓮來上手術台，來接受疼痛的凌虐；而過程中，阿蓮從頭到尾被綁在病床上，無處可逃，但他仍可以看護之姿出入病院，仍有轉圜的空間餘裕：外出、吃飯、傷心、回返、流淚，再外出、吃飯、傷心……等，甚至，在深感挫敗，不忍見阿蓮痛苦而安慰的剎那，他仍不忘其思考，其哲理：

「我愛妳，阿蓮。」

我哀愁的說。疼痛來了，她的手自我手中抽出，捉住腦後的鐵條。它過去了，手癱軟下來，額上冒著汗。

「不要說。」

同時她對我搖搖頭。

「妳知道嗎？愛不是一次會整個撲向我們，它是逐漸的加起來，一分一寸地疊積起來，就像採集花朵，一株一株地。」

她不耐煩的皺曲面孔。

「妳懂嗎，阿蓮？」

「不要說了，痛又來了。」

她整個神經再被痛苦攫去，軀體翻騰嘴裡哀鳴起來。(280)

便是這樣，若「愛」便是與阿蓮「平均分配苦痛」，但賴哲森如何讓自己與阿蓮「平

均分配苦痛」？看來，這段醫療歷程好不容易在「取去死胎」之後露出難得的曙光，但我們對於賴哲森是否因此被治癒，卻無甚把握。手術完後，賴哲森說道：「我要抗辯不公，為什麼我的肢體完整而精神已崩潰？人們將如何相信這個世界隱含在其軀殼內的真實呢？」(284) 我們亦要問：「我們將如何相信賴哲森隱含在其醫療內的真實呢？」手術尾聲，做為命運戰鬥者、詮釋者的醫生，其奮力拖拉出死胎，讓一個生命舒舒地喘息一口空氣，如此的戰鬥、詮釋，能啓示賴哲森、我們「愛／醫療／家」的真意嗎？

(三) 回到有限的個人：人人都參與在世界的無愛之病中

在參與了阿蓮的「取去死胎」手術後，賴哲森是否已被治癒？小說繼續寫道賴哲森與阿蓮出院的生活，那應已「被治癒」的賴哲森，竟又以手術之前的面目現形，甚且是一個較諸以往更具支配性，更無法與世界相容，乃至更憤怒不平的賴哲森。首先，這一次住院已把阿蓮少數的積蓄用盡，而賴哲森已丟了工作，在阿蓮需要休養不能工作的情況下，賴哲森竟斷定自己已不能在社會工作，因為「我的性格已經過分堅持我所規劃的做事原則而與整個社會對抗起來了。」(286)；其次，賴哲森終於在報章發表文章，眼看賴哲森開始能賺錢，渴望有孩子陪伴的阿蓮遂趁機提出懷孕的願望，然而賴哲森即刻阻止這樣的念頭，且因此惱怒起來，數落阿蓮不能真正了解他以及對人生的計畫；再次；隨著賴哲森所寫就的小說被退稿回來，想要以寫作為業的他旋即升起一種被排擠的悲憤感，因而對「無法同享人間的所有樂趣這個命運感到極大的不平。」(291)，偏偏此時，賴哲森又發現阿蓮瞞著他偷偷懷孕，因而遂將長期以來所壓抑的憂悶憤怒向阿蓮一次爆開，而令賴哲森驚訝的是，那向來服從、相信他的阿蓮竟也以同等的暴怒對抗著他，她揭露她幾年來對他的容忍，如鏡照般：「她對男性所抱的痛恨之深不亞於男人對一個不當的社會的痛恨」(291)，其後阿蓮甚至離家出走。

怎麼會是這樣的結果？憤怒、對抗、爭執，「家」如此脆弱，甚至在岌岌可危中。為何參與了「取去死胎」的手術後，賴哲森仍未治癒？為何他無法斷除致病之鎖鏈？不妨將焦點再放置於「醫療」的隱喻來。前文提到，賴哲森所需要的醫療是一生命意向性的治療，因此必須由症狀表象一步步向內，以觸及疾病之根源，最後則要「取去死胎」才可能獲致生機。然而問題來了，若「死胎」是使人致病的癥結，那麼，恐怕就生命意向性的醫療言，要「取去」便不只是「死胎」，而是「致使死胎產生」的原因，若未能真正面對這一問題，難保死胎不會再次生出，

難保不會讓「醫療」淪為一次次的「外在形式」之治療。如是，我們要問的是，賴哲森意識到這個內在於醫療本身的問題了嗎？

難以斷除的病之鎖鏈。小說繼續寫道：阿蓮的離家讓賴哲森看到自己不願承認的暴力一面。他深深罪責、懺悔，並向上帝許願永不再將憤怒之情轉移酷待阿蓮。第二日黃昏，阿蓮帶著疲倦的腳步回來，滿心愧疚的賴哲森熱淚盈眶地在門口迎接她，然而阿蓮的回應已趨冷淡。而後一心挽救的賴哲森再與阿蓮一起到婦產科檢查，且為慎重起見問起上次流產原因，醫生答以意外，但梅毒也可能造成這樣的結果。疑心不安下，賴哲森請求驗血，第二天且獨自到醫院看報告，而醫生竟告訴他，他的血液充滿梅毒的病菌，甚至阿蓮腹中的胎兒可能會再次遭到厄運——已無疾病的祕密了，致病之癥結與醫療處方皆已攤開眼前：賴哲森自己便是死胎的孕育、生產著，在梅毒血液的流動中，他的每個漠視逃離，高傲孤絕，不願意與自己、世界的真實遭遇，便是蘊釀出一個個死胎的動能，而其結果，便是再將阿蓮送上手術台，在「取出死胎」的手術後，等待著下次再被送上手術台，這是他與阿蓮「結婚」的實情，他們所共築的「家」的樣貌，更是掩在他的「醫療」背後的真相。告別醫生後，賴哲森道：

我告辭出來後，這一刻，任何事都離開了我的思緒，什麼都像自行退後，一切愛慾都完全遁跡，我成為一個空洞且悲哀的人。我是個充滿血毒的男人，我以前所發表的憤怒之詞全屬空言，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去死。我開始疑問我的血液中的病毒從何而來？我未曾與任何和我戀愛的女人交媾，包括丘時梅女教師，我曾衝動地步入妓院，但被嚇退了出來，她是清白的，唯一可尋的就是遺傳。(293)

正是這樣，當賴哲森在尋求醫療之際，他的身體亦正流著代代相傳的梅毒血液，²⁷賴哲森依此血液的流動而存活，甚而展開他的醫療歷程。準此，「疾病/醫療」的底

²⁷ 我們可注意到，「梅毒」一般是透過性接觸所傳染的疾病，但賴哲森的「梅毒」卻是無性行為的「遺傳疾病」，此一情節隱喻性十足，正可呼應於我們前文所說的，賴哲森的問題是現代人的冷漠問題，亦即人與人之間未曾真正接觸、遭遇（甚至在性行為中亦然，是性慾對愛慾的取代，身體交合了，卻未嘗真正地遭遇彼此），因而：表象性的接觸，無遭遇之病，一代傳過一代的冷漠疏離之生存狀態，便是這裏的「梅毒」隱喻意所在。

頁被掀開：在梅毒血液的代代遺傳與流動中，人人都參與在世界的無愛之病／罪中——「疾病」便是人患者「與世界的關係之病」，如此，由「疾病」所召喚的「醫療」，當然亦須從「人與世界關係」的重新修復開始——無人可置身於世界之外，賴哲森亦然。因此，除非賴哲森接受自己身上流著原罪般的梅毒血液，並承認自己亦便是世界之一員，否則，他的醫療將永遠是一走在「漠視世界」之途的外在形式之醫療，他將永遠扮演著一個無法遭遇，也沒有熱情的疏離者，他將永遠看著別人的「取去死胎」手術，而忽略了自己便是那個致使死胎產生的一員，此一倔強的生命圍籬，不正是賴哲森所要面對的「精神病院」？而此一建立在「人與世界關係」的疾病／醫療，不正是所有與賴哲森流著同樣血液的現代人所要面對的疾病／醫療？²⁸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如此道：「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許都沒有意識到的那些慾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譯的對象」，²⁹如是，我們遂可重新看待賴哲森在醫療歷程中所透出的人格特質：從聖母醫院、精神病院、重返馬束小鎮，乃至與阿蓮結婚，在小閣樓上共築家庭了，賴哲森似乎都尋不著一方可以安穩生存的土地，甚至最後，上手術台的都是阿蓮而非他。在賴哲森的醫療歷程中，他一直渴望逃離那無愛之地：精神病院／馬束小鎮／乃至自己的生活世界，但在他尋求醫療的過程中，卻從未放下自己的主宰意志、聆聽他人的需要，並接受自己是世界的一員。他總是不斷地從所要面對的生命課題中逃開，漠視疏離，再三反覆，直至掩藏不住的暴力再次降臨，又再度尋求醫療。如此的「醫療」似是「偽醫療」，在「偽醫療」上，賴哲森仍病著「與世界的關係之病」。論述至此，我們也被帶到意向性治療的終點：賴哲森的與世界關係之病既被攤開，那麼，他可否從此斷除致病之鎖鏈，為自己負起醫療責任？他是要真正的遭遇自我之病，將自己如死胎般的送上手術台？亦或，他要在被告知的疾病真相中轉身，讓自己再次纏繞在致病的鎖鏈中？我們如何看待終局的寓意？

答案揭曉，醫療歷程的終點上，賴哲森以「精神疾病」的宿命，為自己的「醫

²⁸ 一如魯迅於〈狂人日記〉中對狂人之病投以最深的注目眼光：人人都參與在五千年的吃人傳統中，每一個人都是吃人之人，亦是被吃之人，吃人與被吃的合一正是魯迅對病的最深洞察，如此洞察的眼光亦指出「醫療」的方向，內在於此一傳統中的每個人，都要為整個社會之病負起責任來。

²⁹ 見(美)蘇珊·珊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頁42。

療」終篇，一如小說篇名所隱喻的，賴哲森徹底地活出了一個「精神病患」的人格樣貌：在如此嚴峻的命運課題前，賴哲森還是轉過了身去，舉凡理想與責任之衝突、舉凡死胎所帶來的死亡恐懼、命運課題，舉凡聆聽阿蓮的需要……等等，賴哲森皆一一逃避了，且再次把它們帶往疾病的路上，甚且，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朝向馬束小鎮走去，並同化為馬束鎮民的一員——以被化約的「性」來替代「愛」的需要，甚而因此產生愛的能力幻覺。³⁰來看小說末段，賴哲森道：

在這個時候，我能對她表示的就是慇懃地令她多嚐肉體的交合之樂，我現在生為一個男人可供給她的也唯有這一件事能令她由衷的感動……交合是靈魂溝通的契機，高尚而痛快，動人而神聖。這一件事有效地令雙方沉醉而平靜地睡去，醫治了我們，使我們感到生命活著多麼溫暖。我白日時心瘁潰裂，晚上卻獲得了慰安。我開始夢著一個酷肖我的年輕男人上戰場，而且目睹不知來自何方的子彈穿透了他的胸膛，倒臥死去。這是昨夜，黎明醒來，她赤裸裸地僵硬了。這是全部的事實。(294)

醫療歷程到抵終點，暴力的喪鐘響起了。賴哲森再次走向死亡的終局，只不過這次不是馬束鎮民加諸於他，而是由他來加諸於阿蓮身上，受害者與施暴者的合一，賴哲森終究以「外在的醫療」走上「疾病」的道路。因而，賴哲森雖一心一意想逃離「精神病院」，拒絕成為其中的「精神病患」之一員，但逃無可逃，一個有著更高無形圍牆的「精神病院」就在他的生活世界，就在他的「與世界關係之病」中牢牢聳立，而他的醫療歷程，便是揭露此一「人與自我、世界關係之病」的生命歷程，賴哲森醫療的終點，致死的暴力讓我們看到現代人的存在之病，可以說，從卷首到卷尾，卷尾又回返了卷首，賴哲森是走在一條醫療的路上，但醫療的隱喻，又讓我們看到他是如何拒絕真正的醫療，也因此永覓不著家園。最終，我們

³⁰ 羅洛·梅於《愛與意志》中的說法很值得參考：「愛與死之間的關係仍有另一個面向：對性的執念幫助現代人遮掩了對死亡的恐懼。身處二十世紀的我們，已經失去了許多對抗這個普世恐懼的武器……後果是，現今的人們便盡量潛抑對死亡的覺識……性的喧囂環繞在我們四周，企圖淹沒永遠在身旁等待的死神腳步聲。……死亡象徵著最根本的無能和有限性，而由此無可逃脫的經驗所升起的焦慮感，驅迫人們努力掙扎著利用性，以使自己成為無限。性活動是壓抑內在死亡憂懼最現成的方法，並且，人們可以藉著性的生殖象徵，在某種程度上戰勝死亡。」見《愛與意志》，頁147。

還是被帶到故事的終局前：若我們身上亦流著與賴哲森相同的血液，那麼，作為不可逃離漠視的「精神病患／正常人」之一員，人該如何為自己的疾病／醫療負起責任來？

(四) 醫療的寫作：罪性與覺知

「人該如何為自己的疾病／醫療負起責任來？」在醫療歷程最後，我們以為尚待思考的問題是：既然賴哲森向來以寫作的理想而活，也以想要獲得寫作的自由而尋求治療，那麼，「寫作」與「疾病／醫療」之關係為何？就「疾病」言，賴哲森的「寫作」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就「醫療」言，怎樣的「寫作」才能讓賴哲森獲致生命之治療？有可以回應「為醫療負起責任」的理想寫作嗎？若有，它是怎樣的寫作？如此的「寫作」，可以對詮釋者的我們產生什麼啟示？

在詮釋的終點上，讓我們再回來細讀一次小說。小說終局，雖然賴哲森以「精神病患」的宿命之姿走向悲劇的終場令人唏噓不已。然而，更細心些，我們會發現如此的終場其實隱藏了一個啟動內在醫療的新契機——小說中，賴哲森扼死阿蓮的情節，是由賴哲被警察逮捕後的自白所供出，詳情是這樣的：當賴哲森發現躺在身旁的阿蓮已死去、僵硬，隨即展開逃亡之旅（又是逃開），但不久便被等在車站的警察所逮捕（無處可逃），小說寫道被逮捕後的賴哲森如此的自白：

當他們以為我故意狡辯或冒充精神失常時，便開始用他們的老辦法私刑了我，我阻止了他們那種缺乏審問方法時所喜歡搬弄的粗暴，我說我雖親自扼死了她（他們這樣告訴我這事實）那也是暗中他們假借了我的雙手。由於他們之中無能完成一篇較好的供詞，而且顯然一篇親自說的供詞要真實的多，他們答應要禮待我，這也是我的要求，我說我的動機都是出於忠實地報告了我的生活和感覺。（290）

宜注意「那也是暗中他們假借了我的雙手」之意，亦即不僅受害者與施暴者是合一的，審問者與罪犯也可能便是同一類人，再次證明了人人都是世界之一員，且都參與在世界的疾病／罪惡之中，無人可置身事外。然而，就「醫療」的寓意言，我們更要注意到一個存在於敘事結構上的問題：警察所以得知賴哲森將阿蓮扼死的犯罪事實，是賴哲森以自白所供出、寫出的。因此，這一「罪的自白」，罪性的覺知，便是隱藏在悲劇終場的一線曙光，而它不正回答了我們以上的問題？——

「寫作」的醫療契機便是：能自覺於自身之病／罪的寫作，才是「為疾病／醫療負起責任」的寫作，人唯意識到自身的黑暗罪性，才能免於無知與暴力；也唯透過罪性的覺知，「寫作」才能真正地獲致靈魂的深度與重量。「為疾病／醫療負起責任」的寫作是人與世界真誠交往的寫作，它是人體會關係與責任的歷程，而非個人主義式的表白或耽溺；「為疾病／醫療負起責任」的寫作是致力於衝擊所有致病僵界的寫作，它敏於覺知人潛抑極深的罪性，因而絕不滿足於以疏離者的高傲之姿來建築文字的高牆；「為疾病／醫療負起責任」的寫作，是人與世界深度對話的寫作，亦是人與自身命運交流的寫作。來看一段劉再復在《罪與文學》中的論述：

寫作如果是一種努力的話，文學家要喚起的正是沉睡的良知。通過自己對道德責任的承擔，表明在這個世界裡，每一個人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也許相互之間根本不相識，但冥冥之中卻有神秘的聯繫把人們帶到一起，人類的境況、利益與幸福是休戚與共的，是相互關聯的。人類靠這微若懸絲的信念，才多少減輕或避免了與生俱來的苦難、不幸與墮落；正是靠了這種信念，人類才得以提昇心靈的境界，邁向光明的生活。³¹

在「寫作如果是一種努力的話，文學家要喚起的正是沉睡的良知」中，「醫療」與「寫作」的關係被緊緊地勾連一起了。此一從「覺知／良知」所出發的醫療之寫作，可視為對賴哲森作為一個寫作者，所追求的寫作理想之醫療，亦是對寫作賴哲森的「寫作者／七等生」之再醫療，³²而此「再醫療」，不也啟發了「詮釋者」

³¹ 見劉再復、林崗著：《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6。

³² 羅洛·梅於《愛與意志》中的說法很值得參考：「衝突的發生，預設了個人的內心渴望在整體層次上（Gestalt，完型）有所轉變，並也掙扎著探索新的生命，如此便打開了新的創造性管道。/……沒有一個作家是為了已經找到了答案而寫作；相反地，他寫，是因為自己內心藏有難解的問題，而亟欲找到答案。然而，這個答案並非意在解決問題，而是作家藉著與問題的角力過程，他能將自己帶領到一個更深邃、更寬闊的意識向度。……創造對他們而言是一種不斷試圖尋找出路的內在經驗——『要去探索、尋找，而永不屈服。』繪畫或書籍為這個世界所帶來的貢獻，是一個尋求的過程。」，頁244。以上可作為七等生的可以「以寫作來完成自我」的成立前提，同時，也可以作為詮釋者的所以可以「在詮釋中完成自我」的原因說明。

重新看待「寫作」的醫療意？

「覺知/良知」把「寫作」帶到人與世界的真實關係中；反過來說，透過「寫作」，我們亦進入了自我與世界關係的「覺知/良知」中。覺知、寫作與醫療。因而我們可以如是表述作者、作品與詮釋者的「視域融合」：³³當我們（作者、詮釋者）以「精神病患」來命名「賴哲森」時，此一命名亦便是所有命名者對「自我內在的賴哲森」之覺察；而當我們逐步地進入賴哲森與世界的關係時，我們亦便是在同等地審視自我的存在狀態；賴哲森與世界的交往對話，亦便是我們與世界交往對話的鏡照；而賴哲森所恐懼的「精神疾病」，亦便是存在於我們心中深處的自我之病；最後，賴哲森所要面對的罪的審判，亦便是所有同在世界之人所無法漠視的良心咎責。人人都無法自外於世界之病的責任，亦無法自外於世界以尋求醫療。如此看來，賴哲森的「寫作」、作者的「寫作」，乃至詮釋者的「寫作」，都在此一「如何癒精神疾病？」的問題中交會、對話了一回。「疾病」召喚「醫療」，「醫療」帶出「寫作」，如此的「醫療之寫作」或可讓我們警覺人是如何在冷漠疏離且無愛的現代社會，一磚一瓦地建築起冰冷的「精神病院」之高牆？

³³ 詮釋學中，所謂的「詮釋學經驗」是以一種「效果歷史意識(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進行詮釋。所謂的「效果歷史意識」，(德)詮釋學家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提到：「真正的歷史對象不是客體，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物，是一種關係，在此關係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一種正當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真實。」〔見高達美：《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頁283。〕亦即詮釋並非是一個孤立於歷史之外的行為，詮釋的主體亦非一個具客觀性的主體，詮釋須在歷史之中進行，詮釋者必須向著整個歷史敞開自身，才能賦予歷史以特殊的意義。因此，詮釋是與歷史的不斷對話，透過此一對話使人與歷史產生關聯，這便是把自己置入於歷史的視界中，從中獲取一種超越於個別特殊性，更高存有的普遍性意義。因此，當我們進入歷史的詮釋時，我們的視界或歷史的視界並不會被取消，反而是在詮釋的過程中，共同構成了一個包容現在與歷史的整體性視界，這便是所謂的「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然而，在這裡我們還要注意，在「視域融合」中，意義所以可以獲得，是與歷史所憑藉的語言脈絡相關的，亦即，我們所以可以獲致詮釋的經驗，總是在語言脈絡中進行，而語言脈絡所憑藉的便是符號、文本或作品。是這些媒介構成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總在這些歷史傳統中進行詮釋，並賦予意義，因而此一詮釋，亦可視為作品、書寫者、詮釋者三合一的「視域融合」之過程。

五、結論：走在一條疾病／醫療的路上

羅若·梅曾如是討論精神疾病與藝術之關係：「藝術精神官能症皆有預示的作用。由於藝術是來自潛意識的傳達，它向我們揭示著一個迄今尚未出現的人的形象，此形象僅對那些具備敏銳覺察力的社會成員們顯現，這些人活在我們社會的最前線，宛如一隻腳的足尖已踏在未來之境。」³⁴透過〈精神病患〉中，賴哲森在疾病中的尋求醫療，作者為我們揭示了一幅內在於人的生命景觀：失卻定向、覓無居所、冷漠疏離也拒絕感受，然而此一無愛的荒原景象，卻也召喚出內在於人心的「醫療」渴求：尋找定向、覓得居所、恢復體驗更能與人交流，如此的醫療所觸及的已是賴哲森/現代人的存在之病，因而這已遠非疾病表象的治療，而是愛的意向性之醫療。

從意向性的治療看賴哲森所展開的醫療歷程，疾病在賴哲森身上的現形之始便是尋求醫療的起點，從被「聖母醫院」驅逐，到希望不要被同化為「精神病院」的一員，驅逐與逃離之間，賴哲森已顯現出他生命上的病症便是覓無居所：無法成為世界之一員的局外人問題，而如此的病症，也帶出賴哲森所需要的醫療，他必須重新開啓與世界的對話管道以尋求生命的定向。與此同時，賴哲森與童年友伴阿蓮相遇，其後同遊、互獻、結婚，在醫療的隱喻上，正是賴哲森被要求重返自己生命深處的經驗，與阿蓮締結為「永恆的愛人」之關係，賴哲森必須真實遭遇命運，並從這裡修復與自己、他人乃至整個世界之關係，這也是「家」的寓意之所在。而為突破醫療的瓶頸，在時間向度上，賴哲森又更深入地探入了所潛抑的過往生活經驗：馬束小鎮的生活以及與丘時梅戀情的受挫經驗。在賴哲森眼中，隱喻著現實世界的馬束小鎮是一個看似正常，實則扭曲的地方，生命的所有環節都在生著虛偽與冷漠之病，在此一麻木而僵滯的小鎮中，被潛抑的生命力轉以「性」的騷動，以及掩藏其間的「暴力」顯現，更糟糕的是，一心渴望逃離冷漠小鎮的賴哲森，亦被小鎮的冷漠暴力包圍了，尋無出路，甚至被逼至死境之中。

然而僅僅理解致病的因素是不夠的，在生命意向性的醫療中，面對著未來的生活，賴哲森仍須具備創造新局的能力，亦即他必須將眼前的生活衝突視為命運事件，他必須在每個生命變局中，找出新的可能性來，如此他才能醫治生命的流離失所，並覓得家園。但賴哲森與阿蓮結婚後，生活的變局一一接踵而來，阿蓮

³⁴ 見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頁13。

懷孕、死胎、再懷孕，又再次死胎，一次又一次，賴哲森無法讓自己走出「馬束小鎮」甚至是「精神病院」的圍牆，仍一貫地展現其漠視、高傲、無法參與世界乃至主宰他人之姿，直至他體內的梅毒血液被驗出，致病的癥結與醫療的底牌被掀出：他便是冷漠世界的一員，在與世界的關係中，他的病便是「與世界的關係之病」，他無法以漠視疏離的逃避之姿，自外於世界尋求醫療。因此，除非他真正遭遇他的疾病，且願意將自己送上手術檯，接受「取去死胎」所意味的：以舊我之死來換取與世界的新關係之手術，否則，他永遠不知道什麼是愛？更不可能與「阿蓮／永恆的愛人／命運」真正的結婚，他身上的致病鎖鏈一天未斷除，便永遠找不到家的認同與方向，而須永恆地在無愛大地上流著病人／漂泊者的眼淚。然而，賴哲森既以梅毒血液而活，生存的恐懼中，他還是走上了漠視之途，至於那潛抑不住的暴力，則將自己與他人，乃至整個世界都帶往了一片黑暗死地中。賴哲森扼死阿蓮，足見醫療之不易，但從疾病到犯罪，此一生命歷程的終局，亦全然揭出了流動著梅毒原罪血液的賴哲森之病、世界之病。

最後，從賴哲森的犯罪自白中，本文亦從討論了「寫作」之於「醫療」的意義，而提出「醫療的寫作」即是一溝通良知的「覺知的寫作」，如此的寫作將是對自我之病、存在之病的覺察之寫作，因而，賴哲森所要面對的罪的審判，亦便是所有同在世界之人所無法漠視的良心咎責。「疾病」召喚「醫療」，「醫療」帶出「寫作」，如此的「醫療的寫作」讓人可以在「疾病」上施行愛的醫療，如此的「醫療的寫作」，或可讓我們重新思索「寫作」的意義，且警覺著自己是否亦是現代文明下，以正常人現身的「精神病患」之一員。

引用文獻

一、

- 七等生：《初見曙光》，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僵局》，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離城記》，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沙河悲歌》，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城之謎》，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銀波翅膀》，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重回沙河》，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譚郎的書信》，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 七等生：《一紙相思》，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

二、

-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
- 尤娜、楊廣學：《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自卑、自憐與自負——七等生「現象」〉，《文星》114期（1987年12月），頁116-122。
- 吳而斌：〈七等生的《放生鼠》〉，收入張恆豪編《火獄的自焚》，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49-58。
- 余虹：《藝術與歸家——尼采、海德格、福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周芬伶：《聖與魔》，臺北：INK印刻出版社，2007年。
- 洪銘水：〈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的道德挑戰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的道德挑戰〉，收入《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保羅·里克爾(Paul Ricoeur)著，翁紹軍譯：《惡的象徵》(The symbolism of evil)，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年。
-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鄧伯宸、梁永安譯：《恐懼》(Landscapes of Fear)，臺北：立緒出版社，2008年。
- 耿占春：《隱喻》，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

- 高全之：〈七等生的道德架構〉，收入張恆豪：《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91-112。
- 高行健：《論創作》，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年。
- 夏志清：〈臺灣小說裡的兩個世界〉，收入張恆豪：《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239-260。
- 黃克全：〈精神與自然——七等生小說中的男女關係〉，《中國時報·副刊》，（1981年1月10日）。
- 陳昌明：〈論七等生的「精神病患」〉，收入張恆豪：《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219-232。
- 陳國城：〈「自我世界」的追求——論七等生一系列作品〉，收入《離城記》，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頁341-352。
- 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劉嘉雯、魯宓譯：《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What Really Matters :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臺北：心靈工坊出版社，2007年。
-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張恆豪：《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
- 葉石濤：〈論七等生的「僵局」〉，收入張恆豪：《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9-22。
- 楊牧：〈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重回沙河》，臺北：遠景出版社，2003年，頁363-376。
- 榮格(C.J.Jung)著，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年。劉國彬、楊德友譯：《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林宏濤譯：《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Menschenbild und Gottesbild*)，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年。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臺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
- 齊美爾(Georg Simmel)著，劉小楓選編、曹衛東譯：《現代性、現代人與宗教》，臺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
- S.K 圖姆斯著，秋鴻鍾等譯：《病患的意義：醫生和病人不同觀點的現象學探討》，

山東：青島出版社，2000年。

劉紀蕙撰：《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北：立緒出版社，2000年。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香港：牛津大學，2002年。

羅洛·梅(Rollo May)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Freedom and Destiny*)，臺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彭仁郁譯：《愛與意志》(*Love and Will*)，臺北：立緒出版社，2001年。朱侃如譯：《權利與無知》(*Power and Innocence*)，臺北：立緒出版社，2003年。彭仁郁譯：《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臺北：立緒出版社，2004年。

蕭義玲：〈走在一條建造家屋之路——論七等生《重回沙河》中的時間光影與生命家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第十二期，2008年12月。

蘇珊·珊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

Jung, C.G,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5. Bollingen Se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Jung, C.G,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1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Eros, Alienation and Violence——on Diseases and Therapy in Qi Deng Sheng's "A Psychopath"

Hsia Yi-ling*

[Abstract]

The metaphor of "disease" sheds light on issues of social culture and the status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as it is one significant link in modern issues. In terms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this text tries to raise one question why Qi Deng Sheng selects "Psychiatric Patients" as the metaphor of modern people's existence in the "disease/medical therapy?" How will the metaphor of "disease/medical therapy" be presented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the novel? How will Qi Deng Sheng, who is good at incorporating himself into the writing and intends to achieve self-realization in his writings, explore the "world of his inner life" through "Psychiatric Patients?" Furthermor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for those who lead rich life, will the author's elaboration of "psychiatric diseases" and "psychiatric patients" enlighten us?

In the novel, Che-Sheng Lai, the leading role, seeks medial therapy, and we will see the outlook of his inner life: disorientation, having no fixed abode, aloofness and alienation, and refusal. The scene of wasteland lacking passion also gives an embodiment of calling on a thirst for man's "inner therapy": seeking orientation and abode and having a recovery to have exchanges with people. What involved in such medical therapy not only will focus on Lai's disease, but the prevalent diseases modern people will suffer. In such context, "medical therapy" will ultimately emphasize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ung-Chen University.

therapy on the passion of intentionality, rather than the one on the symptoms of diseases. We will be led to the mind of self existence through such metaphor of diseases, thus exactly embodying the profund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Disease, Medical Therapy, Writing, Qi Deng Sheng, Psychiatric Diseases, Metaphor, Alienation

